

# 基于企业数据的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张锦娟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在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其外商直接投资演变特征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基于2010—2023年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数据，从州市尺度系统刻画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深入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从空间格局看，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分布呈现显著的非均衡特征，形成以昆明为核心、德宏、西双版纳、大理等为次级节点的“核心—边缘”结构，边境区位与跨境通道对外资布局具有明显引导作用；（2）从时间演变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持续增长，存续规模稳步扩大，产业结构呈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三二一”格局；（3）从空间演化看，外商投资格局由早期“单核集聚”逐步演化为“省会主导、边境崛起、多点扩散”的结构特征；（4）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构成外资进入的基础条件，工资水平与城镇化进程通过成本与配套环境共同影响外资区位选择，而对外开放程度及通道型基础设施建设在云南外商直接投资中发挥着关键的战略性作用。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时空演变；“核心—边缘”结构；边境区位

DOI:10.12417/2982-3382.26.01.015

进入新时代，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将其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引擎。将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国家定位，赋予了云南省在国家开放中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作为知识技术溢出的重要载体，外商直接投资可创造就业机会、缩小技术差距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sup>[1]</sup>。国内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在时空格局刻画、影响因素识别和方法体系构建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多以全国或省级尺度为主，对边疆省份的关注不足。以云南为例，研究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可为地方政府在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开放水平、优化营商环境和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提供决策参考；也可以为中国广大的西部、内陆和边疆省份等同类地区提供可借鉴的“云南方案”与分析方法，同时也为地方招商政策提供依据。

## 1 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 1.1 投资现状

从省域整体尺度看，外商投资企业在云南省范围内广泛分布，但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外商投资企业主要分布于滇中、滇西南和滇东南部分区域，而在滇西北及部分山区分布相对较少。从空间形态上看，外商投资企业在省域范围内并未形成均匀分布格局，而是呈现出以局部区域高度集聚为主、其他地区零散分布的总体特征。表明，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布局上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州市尺度上，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差异显著（表1）。昆明市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全省比重的50.84%，在所有州市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其余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明显低于昆明市，数量均不足300家，区域差异较为突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构成外商投资企业分布的次级区域。相比之下，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较少且占比较低。总体来看，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在州市尺度上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分化特征。

州市	POI点	占比
保山市	74	2.19%
楚雄彝族自治州	137	4.05%
大理白族自治州	168	4.96%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207	6.12%
迪庆藏族自治州	31	0.92%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127	3.75%
昆明市	1721	50.84%
丽江市	103	3.04%
临沧市	70	2.07%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20	0.59%
普洱市	89	2.63%

州市	POI点	占比
曲靖市	136	4.02%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58	1.71%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271	8.01%
玉溪市	104	3.07%
昭通市	68	2.01%

### 1.2 投资特征

空间集聚与分布不均特征，外商投资企业并非随机分布，而是高度集中于少数核心区域，尤其是以昆明市为代表的滇中地区，形成全省最为显著的集聚中心。这种集聚格局反映出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性特征，即少数区域承载了绝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而多数地区外商投资规模有限，区域差异明显。以省会昆明为主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结构上呈现出显著的省会中心特征。昆明市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比超过全省一半，与第二梯队城市相比差距显著，形成典型的核心集聚结构。在昆明市之外，西双版纳、德宏、大理等州市构成若干次级节点，但其规模和集聚程度与核心城市仍存在明显差距。整体来看，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核心、次级节点为补充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边境与通道导向特征，从区域类型看，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边疆区位特征。德宏、西双版纳、红河等边境州市在外商投资企业分布中占据一定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多依托口岸条件和跨境通道布局。这种空间特征表明，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受到省域内部经济条件的影响，也与其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 and 对外开放通道密切相关。受自然地理条件约束特征，结合地形高程数据可以发现，外商投资企业主要分布于中低海拔地区，而在高海拔山区分布明显较少。这表明自然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选择形成了约束。复杂的地形条件通过影响交通可达性、建设成本和基础设施布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产生间接影响，从而强化了外商投资企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趋势。

## 2 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变化

### 2.1 外商直接投资的时间演变

总体趋势上看，企业数量持续积累、存续规模稳定扩张、外商直接投资活力总体增强。从数量规模来看，外资企业总量持续积累，2010年约2000家企业增长至2023年5000多家，

规模扩张约1.5倍，表明外资进入云南的趋势较为稳定且具有突出的吸引优势。企业存续情况则可以反映外商投资质量、风险承受能力及区域营商环境的稳定性，作为衡量外资经营质量的重要指标，存续企业规模从2010年约1500家增长至2023年约3000家，虽少于累积企业数量，但存续企业数量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反映出逐年增加的存续量说明外资企业整体经营状况良好，企业退出率较低。

从行业类型上看，按照天眼查导出数据中的“所属行业门类”以确定行业类型，同时参照国家统计局设管司最新的三次产业划分标准，对2010—2023年间云南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产业划分。在研究范围2010—2023年内，从企业数量构成看，第三产业数量均高于第一、第二产业数量，且增长最为迅速，是外资聚集的主阵地；第二产业次之，构成了重要的实体投资基础；第一产业数量最少，且增长最缓，属于高原农业特色投资领域。从产业占比来看，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第三产业占比明显高于第一、二产业占比，且占比呈现上升趋势，主导地位日益强化；第二产业占比则出现较为显著的下降趋势，反映出外资流入的重点正在向服务业快速倾斜；第一产业占比则保持基本稳定。三次产业数量与占比均呈现出“三二一”结构，高度聚焦第三产业，属于技术与服务驱动型模式，外商投资的企业类型逐渐往轻资产、高附加值的发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与全国外商投资普遍向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不同，云南省第三产业外商投资更多集中于通道型、市场型与消费导向型服务业，体现出其外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位依附性和边疆开放指向性。具体来看：

### 2.2 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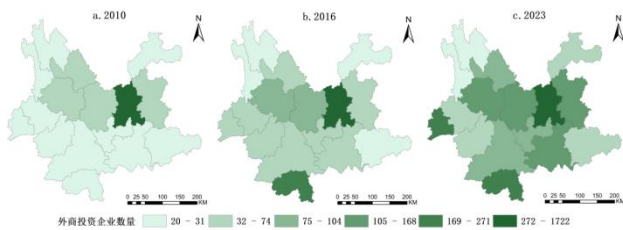
2010年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在16个州市都有分布，但以昆明为主形成“单核投资区”，曲靖、楚雄、大理和丽江范围外商投资企业最多，其他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较少。形成“以省会为中心，辐射周边州市”的投资格局（图1a）。

2016年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较2010年明显增多，且在西双版纳州增多最为明显，省会昆明仍然为投资中心，西双版纳州与昆明成为“双核投资区”；楚雄州与大理州投资企业数量增多也较为明显，但与版纳相比不突出；迪庆州、昭通市、文山州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增长最为缓慢，除此之外，其他9个州市投资企业数量增长则较为稳定。形成以“以省会为中心，边境崛起”的投资格局（图1b）。

2023年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增多最为明显，除迪庆州和怒江州外，在其他13个州市投资企业数量都有明显的增长。在德宏州的投资企业数量赶超昆明周边的大理州和楚雄州，与昆明、西双版纳州成为“三角投资区”；在红河州与曲靖市的投资也有明显的增多，两个州市与大理州、楚雄市形成第二层

次投资高值区。形成“以省会为中心，辐射周边州市，边境崛起”的投资格局（图1c）。

在未来，现有格局可能进一步演化，随着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的推进，临沧等地的区位价值可能提升；而随着昆明都市圈的强化，玉溪等地的配套吸引力可能增强。



### 3 影响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

#### 3.1 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规模是衡量区域市场容量与劳动力供给潜力的重要指标<sup>[1]</sup>。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共同构成了云南市场吸引力的基本面。截至2024年末，云南拥有4655万常住人口，在西南地区构成一个不容忽视的消费市场雏形，这为市场寻求型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最基础的逻辑。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潜在的需求总量，尤其对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产业而言，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然而，单纯的人口数量只是一个静态指标，其经济价值必须由动态的“经济发展水平”来激活和定义，本文采用人均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sup>[2]</sup>，云南的人均GDP长期处于全国省份排名的后位，这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较低的人均GDP直接反映了本地居民购买力和消费层级的局限，可能抑制对高品质、高价格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阻碍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另一方面，它也标志着云南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期阶段，存在巨大的追赶势能和结构升级空间。对于眼光长远的外资而言，这预示着未来市场增长的巨大潜力。特别是当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云南自身

#### 参考文献：

- [1] 杨洋,黄宁.中国FDI发展路径的“转型假说”--双向FDI逆周期增长的内在逻辑分析[J].经济学家.
- [2] 宣烨,余泳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来自230个城市微观企业的证据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3] 田素华,李筱妍.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双向发展的内在机制——基于人均GDP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 [4] 冼国明,徐清.劳动力市场扭曲是促进还是抑制了FDI的流入[J].世界经济,2013,36(09):25-48.

的产业政策开始显效时，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升将逐步释放市场的深度与广度。

#### 3.2 工资水平与城镇化进程

工资水平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最直接的成本因素，用人均工资水平作为城市工资水平的衡量标准。相较于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云南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这为承接国内东部产业转移和国际上对成本敏感的外资提供了基础条件。

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空间聚集，更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链配套和人力资本的系统性升级过程。云南的城镇化率虽持续提升，但仍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其城镇化仍处在蕴含机遇与挑战。从挑战看，城镇化滞后可能导致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足、产业链集群化程度不高、专业人才储备有限，从而抵消低工资优势，增加企业的隐性运营成本。从机遇看，积极的城镇化推进，特别是围绕昆明、曲靖、玉溪等中心城市以及瑞丽、磨憨等重点口岸的城镇建设，能显著改善交通物流、信息通信和能源保障水平。更完善的产业园区、更集中的供应商网络和更便捷的生活服务，能极大提升外资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

#### 3.3 对外开放程度的战略角色

在影响云南外商直接投资的诸多因素中，对外开放程度扮演着最核心角色。它不仅是衡量经济国际化的指标，更是云南突破地理和市场局限、重塑区位优势的关键政策工具。云南的对外开放具有鲜明的跨境特征。从政策维度看，云南享有西部大开发、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红河、德宏三片区）等多重叠加的政策红利。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将云南从国家的西南末梢推向了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中老铁路的通车运营，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探索，以及中越、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极大地压缩了云南与东盟国家的时空距离和经济距离。这种开放格局直接吸引了大量以东南亚为目标市场或资源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